

##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焦虑：

### 《南方与北方》中的伦理选择与身份建构

## The Anxie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thical Choi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North and South*

李 玲 (Li Ling)

**内容摘要：**在《南方与北方》中，伊丽莎白·盖斯凯尔采用英国文学中城乡对立的传统模式，对南方农业文明与北方工业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进行了细致地描绘。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围绕工厂主桑顿通过三次伦理选择从破产商人之子到开明工厂主伦理身份的转变和玛格丽特从乡村到城市伦理环境变迁中的身份建构，展现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伦理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冲突。弥补了缺失的同情心与责任感的桑顿与工人之间建立在交易基础上却饱含温情的伦理关系是传统伦理道德与工业社会中的经济关系相结合的产物，认同了商业理念的玛格丽特最终以债权人的身份参与到工业活动中，既表明工业文明相较于农业文明具有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又传达了道德与财富相结合的文化愿景。

**关键词：**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南方与北方》；伦理选择；伦理身份

**作者简介：**李玲，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Title:** The Anxie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thical Choi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North and South*

**Abstract:** In *North and South* Elizabeth Gaskell describes the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the south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north by featuring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country and cit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approach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howing the changes of ethical relations and ethical conflic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rough three ethical choices of Thornton from the son of a failed businessman to the open-minded factory owner and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argaret from country to city. The new ethic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trade while fulling of warmth between Thornton with sympathy and responsibility and workers is a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ethics and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in industrial society. Margaret's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ial activities with business ideas as a creditor not only shows that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has an irreversible development trend compared with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conveys a cultural vis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morality and wealth.

**Key words:** Elizabeth Gaskell; *North and South*; ethical choice; ethical identity

**Author: Li Ling**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liling2320@163.com).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Elizabeth Gaskell, 1810–1865) 的小说《南方与北方》 (*North and South*, 1855), 讲述了出生于南方乡村赫尔斯通 (Helstone) 牧师家庭的玛格丽特·黑尔, 因父亲宗教见解发生变化, 举家搬迁至北方工业城市米尔顿 (Milton), 与工厂主约翰·桑顿之间冲突与和解的故事。杰罗姆·莫基尔 (Jerome Meckier) 认为盖斯凯尔将其笔下的南方某地命名为地狱之石 (hell/stone), 给北方工业城市冠之以英国伟大的史诗诗人的名字, 表明了盖斯凯尔对工业发展的态度, 诗人们梦想的黄金时代在将来。<sup>1</sup> 萨利·沙特尔沃思 (Sally Shuttleworth) 在《南方与北方》的序言中指出,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南方和北方》并不是合适的书名, 尽管书中传达了一系列对立, 但它们没有一个是稳定的。<sup>2</sup> 上述两则评论, 无论观点如何, 皆关注到“南方”与“北方”作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核心隐喻, 而这也正是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殷企平教授指出, 19 世纪的英国文人们持续地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焦虑, 也即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而引起的焦虑” (殷企平, “经由维多利亚文学的文化观念流变” 83), 这里所说的焦虑, 其实指的就是对转型引发的伦理问题的焦虑。

从作品的表层结构来看, 故事的发展以玛格丽特的城乡生活体验以及桑顿与工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为线索, 但文本深层结构中的伦理主线是玛格丽特在空间变迁中的身份建构以及桑顿通过伦理选择对身份的确认。他们最终的伦理选择和身份建构皆是在相互影响中实现的, 桑顿认同了南方传统文化, 弥补了缺失的同情心与责任感, 玛格丽特接受了北方的工商业理念, 感受到了城市中的进取精神和进步力量。他们的伦理选择和身份建构也是对农业文

<sup>1</sup> See Jerome Meckier, *Hidden Rival in Victorian Fiction: Dickens, Realism, and Revaluation*. Lexington: The UP of Kentucky, 1987, 80.

<sup>2</sup> See Sally Shuttleworth, "Introduction", *North and South*, (ed.) Angus Easson. New York: Oxford UP, 2008, xi.

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焦虑的回应。<sup>1</sup>在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宏大叙事背景下，桑顿被视为成功的商人，然而从桑顿对工人阶级的态度来看，他显然缺乏同情心与责任感，并且无力缓解日益严重的劳资冲突。盖斯凯尔旨在通过对以桑顿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道德局限性的刻画，突显以玛格丽特为代表的南方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桑顿的影响下，玛格丽特也在传统伦理失去现实根基的情况下，做出了相应的改变。就小说的道德寓意而言，盖斯凯尔希望包括维多利亚资产阶级在内的读者能以桑顿和玛格丽特的故事为鉴，实现工业社会中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平衡。

### 桑顿的三次伦理选择

在阐释桑顿的伦理选择时，我们必须将伦理问题的讨论回归当时的伦理环境。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工商业理念在北方工业城市中被广泛认同，人们的进取和奋斗精神也日益高涨。作为破产商人之子的桑顿从背负父亲欠下的债务到成为米尔顿享有盛誉的工厂主即是个人奋斗成功的典型。商人在经济活动中遵循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平交易”、“供求关系”以及“自由竞争”等法则，并逐渐将之运用于经济领域之外，使其成为支配整个社会的伦理规范，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桑顿与工人劳资冲突的加剧即是政治经济学规则在人际关系中运用的结果。桑顿从父亲经商失败被迫承担起养家的重担到自己与工人之间建立新型伦理关系，主要经历了三次重要的伦理选择。通过三次伦理选择，他最终完成了伦理身份的转变，即从破产商人之子的身份转变为开明工厂主的身份。桑顿伦理身份的转变既展现了诚信、节制的品质和奋斗、进取精神对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的重要作用，又彰显了以玛格丽特为代表的南方传统文化中的同情心与责任感对北方工业社会中以政治经济学为主导的经济活动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在三次伦理选择中，桑顿不仅经受了复杂的道德考验，而且为缓解工业社会中的矛盾做出了新的尝试。

“伦理选择活动往往是由人的身份决定的，不同身份的人往往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也构建新的身份”（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伦理选择与理论建构”77）。桑顿的第一次伦理选择是主动偿还父亲欠下的债务，并由此实现了从破产商人之子到工厂主身份的转变。桑顿偿还债务有两个前提：首先，他作为债务人的儿子，承担着偿还债务的责任。其次，经商的背景和对商业理念的认同，让他有意愿也有能力从事与商业相关的职业。桑顿在布店做伙计，每周可以挣十五先令，而十六年后，作为工厂熟练工人

<sup>1</sup> 面对转型焦虑，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家们纷纷做出了回应，如托马斯·卡莱尔倡导“工作福音”，寻求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平衡；马修·阿诺德主张通过“文化”使新旧世界得以衔接；查尔斯·金斯利倡导始于心灵的社会改革实践；约翰·罗斯金强调工作/劳动过程中的创造性愉悦；威廉·莫里斯提倡艺术地生活。参见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的尼古拉斯·希金斯，每周才能挣十六先令，可见当时桑顿的收入已相当可观了。面对父亲欠下的债务和困难的家庭条件，摆在桑顿面前的是两个选择，第一，不承担还债的责任，因为“债主们早已放弃了希望，认为老桑顿先生欠下的债务绝对偿还不了”（97）<sup>1</sup>，桑顿可以利用自己的收入改善家庭的生活环境，但这样就违背了诚信的原则；第二，选择还债，就必须节衣缩食，“有好多年他们完全靠吃稀薄的麦片粥生活”（97），这就迫使桑顿在坚守诚信和向生活妥协之间做出选择。正是桑顿对诚信的坚守，让他选择了偿还债务，而这一选择也帮助他实现了向工厂主身份的转变。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桑顿工厂主身份的建构让他不得不直面与工人之间的冲突。虽然桑顿在身份转变的过程中表现出精明强干、诚信、节制，无论从能力还是从道德的层面来看，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然而一旦加入资产阶级的阵营，他就具有了资产者的本质特征：理智、富有才干，冷酷无情和唯利是图。<sup>2</sup>桑顿事业上的成功既是对他道德品质的回馈，又使他将社会制度的不公转移到工人自身品质的缺陷上：工人贫困是因为自身缺乏远见和放纵任性。这也是桑顿基于工厂主身份产生的对工人的偏见。

桑顿对工人的偏见以及与其之间的矛盾与其所处的伦理环境密切相关。政治经济学的盛行和“公平交易”法则的广泛运用，让桑顿认为自己与工人之间只是工资与劳动力的公平交易关系，而这实质上是人际关系的维系中机械使用经济学规则的体现，也即是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所指出的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金联结”（cash-nexus）<sup>3</sup>关系。深受南方传统文化浸润的玛格丽特则认为桑顿在其认同的公平交易关系中规避了本应承担的伦理责任。二人伦理观念的不同，实则是工业社会现金联结的人际关系与农业社会家长制关系的差异。

“在工业革命崛起之前，人类社会的治理者大都被比作一家之长，这种家长式模式自有其严重的问题，但是至少披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37）。这里温情脉脉的面纱指的是家长制社会中的贵族和士绅为了维系其管理者的身份，所承担的施舍、赠予、资助等伦理责任。家长制社会中的责任感，正是现金联结的工业社会中所缺乏的。桑顿享有资本带来的权利，却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在玛格丽特看来不仅是冷漠的，而且是不道德的。桑顿与玛格丽特伦理观念的差异与其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在米尔顿，“大多数厂主在儿子十四五岁羽毛未

1 本文有关《南方与北方》的引文均出自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南方与北方》，主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参见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48。

3 参见托马斯·卡莱尔：《文明的忧思》，宁小银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54。

丰时就把他们安置好，好不容情地截断了所有后代向文学或高深的智力修养方面发展，希望使子孙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商业上”（75），这种以发展商业为唯一目标，忽视文学的教育理念，造成了工厂主们传统文化素养的缺失。认识到自身不足的桑顿，寻找家庭教师以提升自己文学方面的素养是其不断追求道德完善的表现，因为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和术语”17）。与桑顿不同，玛格丽特认同的是宗法制乡村社会的古老传统，接受的是伦敦上流社会的教育，她认为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关系，并且在人际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应该承担更多的伦理责任，而这其中蕴含的同情心与责任感，正是桑顿所缺乏的。

以桑顿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责任意识缺失，让他们只看重工人为其创造的财富，却不关注工人的需求，甚至把工人称作人手（hands），认为工人与商品无异，同样遵循着供求法则。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45）中写道“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竟可以像商品一样被卖掉，像商品一样地涨价跌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价格也就上涨；如果需求减少，价格也就下跌”（恩格斯 120）。正是对供求关系的盲目崇拜和伦理责任的缺失，不仅导致桑顿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加剧，也使得桑顿在处理劳资冲突时陷入了伦理混乱。

桑顿从爱尔兰招募廉价工人以应对罢工危机引发了工人的暴动，面对工人的暴动，桑顿选择借用兵士的力量进行武力镇压，这是桑顿的第二次伦理选择。桑顿的这一伦理选择看似简单有效，实则面临复杂的伦理困境。如果不选择镇压，那就意味着向工人妥协，这既违背了他作为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追求，又违背了他与生活抗争到底的准则。如果选择镇压，则违背了他曾宣称的厂主和工人之间正在进行着的公正的战斗。他赋予战斗“公正”的名义，意在强调他遵守的是社会公认的伦理规范，而工人与兵士之间力量悬殊的战斗显然违背了公正的社会伦理。桑顿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与工人之间产生矛盾的必然性，而同情心与责任感的缺失，使他在面对工人的暴乱时选择了武力镇压。敏锐察觉到这一点的玛格丽特对桑顿说：“你要是还有一点儿胆量和高尚的品质，那么就走出去，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那样对他们讲话”（201）。玛格丽特使用“有胆量”和“高尚”这样具有强烈伦理色彩的词汇，试图让他遵循社会伦理，却以失败告终。他虽然走了出去，却拒绝与工人进行有效的交流，以致玛格丽特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来阻挡更多暴力行为的发生。桑顿在经济领域之外机械地使用供求法则，并且在与工人的斗争中违背了公正的社会伦理陷入伦理混乱，也充分暴露了工业社会的弊端，“驾驭社会关系的应该是人道的伦理观念，而不应该是盲目的市场力量”（Stoneman 45）。

玛格丽特对人道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与桑顿对盲目的市场力量的崇拜，让他们围绕工人贫穷的原因、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对立或依存关系、以及人和有教养的人产生了争论，在争论中桑顿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传统文化中的同情心、责任感等观念的影响。在工人的暴动中，桑顿也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一是他“对自己招致的强烈怨恨感到惊愕”（201），因为他认为自己与工人之间本是公平交易关系，此时却成了敌对关系；二是面对暴力袭击，玛格丽特选择用身体去保护他，使他善于发号施令的强者变成了被保护的弱者。劳资冲突的激化和玛格丽特在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既让桑顿对以政治经济学为准则的伦理规范产生了质疑，又让他对玛格丽特所代表的南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传统文化的影响及其伦理价值，在桑顿与工人希金斯的接触中得到了体现与升华。希金斯是罢工的领袖，罢工失败后因遭到工厂主们的痛恨无法找到工作。当桑顿得知希金斯向他寻求工作是为了养育另一个工人的孩子时，这种朴实慷慨的动机触动了他的，“使他完全把单纯主持公道的理由抛在脑后，而凭着一种更高尚的本能超越了它们”（372）。虽然此处并未对“更高尚的本能”做出解释，但这里的朴实、慷慨、高尚恰好呼应了玛格丽特的父亲对古典文学教诲功能的认同：“荷马时代的生活高尚、朴实，对那种生活的回忆难道没有振奋过你的精神吗？”（94）桑顿对古典文学的学习，无疑更有利于他高尚情感的形成与流露。

在玛格丽特的影响下，在古典文学的学习中，在与希金斯的交往中，桑顿对南方传统文化中的同情心与责任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做出了最关键的一次选择，他与工人建立了交易基础上又饱含温情的新型伦理关系，具有了开明工厂主的身份。“玛格丽特对工人的同情尽管是完全真诚的，但本质上却是贵族式的，或者至少是家长制的”（Kettle 182-183）。家长制中的同情心与责任感建立在依附关系之上，尽管对工业社会中阶级矛盾的缓和也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但伦理环境的变化已使其失去了现实基础：工人阶级已经有了对独立与平等的热切追求。桑顿与工人之间的新型伦理关系建立在交易而不是施舍的基础上，超越了玛格丽特最初期望的那种恩主与奴仆间的慈善关系，却同样蕴含了玛格丽特所说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里的交易已不再强调所谓的公平，而是通过“我多么留神注意，让他们自由选择，不把我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他们”（372）来表现桑顿如何小心翼翼地尊重工人的独立。南方传统文化中的同情心与责任感不再依附于阶级优越感和权力意识，工业社会中现金联结的关系也被温情所打破。桑顿把改善与工人之间关系的努力称作实验，虽然其他的工厂主听到他的想法时，“总是神情严肃地摇摇头”（492），但桑顿做出的努力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最大程度地缓解了劳资冲突，调和了阶级矛盾，对解决工业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是桑顿应该坚持的，也是其他工厂主应该

去尝试的。

在三次伦理选择中，桑顿对诚信的坚守和对传统文化的逐渐认同，帮助他实现了从破产商人之子到开明工厂主身份的转变。桑顿节衣缩食偿还父亲欠下的债务，不仅彰显了诚信、节制的道德品质，也展现了工业城市中的奋斗和进取精神。桑顿对工人进行镇压的第二次伦理选择表明尽管桑顿是一个成功的工厂主，但他依然无法缓解劳资冲突，也表明暴力手段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而桑顿在传统文化中的同情心与责任感的影响下做出的第三次伦理选择，通过道德的完善与工人在交流的基础上达成和解，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尖锐的劳资矛盾得到缓和，双方能够以比较宽容和同情的态度相互对待，相处得更为融洽。桑顿的工厂濒临破产之际，工人联名表示若有需要依然愿意为他工作，便是充满温情的承诺。其次，桑顿的转变得到了玛格丽特的认可，这也是玛格丽特将资产贷给他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正如桑顿早年诚信还债的选择帮助他建立了事业，他又一次凭借正确的伦理选择，挽救了破产危机。桑顿在玛格丽特的影响下，批判地继承了南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走出了困境，玛格丽特也在与桑顿的接触中，改变了对商业的态度，在工业城市中建构了新的身份。

#### 玛格丽特的身份建构

作品围绕玛格丽特的城乡生活经历，以“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空间变迁为背景，既展现了伦理环境的变化引发的伦理身份的转变，又在城乡文学传统的继承与突破中表达了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出于对经济和教育优势的追求，玛格丽特从赫尔斯通到伦敦实现了从乡村牧师之女到深谙上流社会社交礼仪有教养的伦敦姑娘的身份转变，在身份转变的过程中贵族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感和对商业的偏见得到强化。伦敦归来的玛格丽特，从赫尔斯通有教养的牧师之女到北方工业城市米尔顿贫穷的家庭教师之女的身份落差，让她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玛格丽特在桑顿的影响下逐渐接受了商业理念，感受到了工业城市中的进取精神和进步力量。玛格丽特最终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债权人的身份将财产投入桑顿的工厂，加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洪流，既表明经济关系的变化对伦理身份的影响，又在伦理身份的建构中突显了工业文明相较于农业文明具有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玛格丽特伦理身份建构的过程，是她对工业城市从抵触到接受的过程，也是南方传统文化与北方工业文明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9）。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背景下，北方工业城市米尔顿体现着物质、资本、竞争、发展、进步。南方农业乡村赫尔斯通

体现着精神、传统、文化、人文精神。<sup>1</sup>将玛格丽特的身份建构过程放置在城乡变迁的伦理环境中，就能更好地理解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伦理冲突。

玛格丽特从赫尔斯通到伦敦的空间变迁造成的第一次伦理身份的转变，既突显了城市的经济和教育优势对乡村人的吸引，又为玛格丽特在米尔顿遭受的文化冲击起到了铺垫作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商业理念已逐渐渗透到农村，人们对经济层面的诉求也越来越高。九岁的玛格丽特被父母送至伦敦的姨母家，“她此行所承载的期望是摆脱赫尔斯顿（赫尔斯通）的农村文化身份，转而接受伦敦城市生活方式，完成身份的改造”（陈礼珍，《天使与鸽子：盖斯凯尔小说研究》91）。虽然这并不是玛格丽特主动做出的选择，但从她躺在床上情不自禁地呜咽，却又认为经过长时期的辛苦筹划不应再感到难过可以得知，她的伦敦之行不只是顺从了父母的愿望，她自己也期待着生活环境的改变。伦敦与北方工业城市不同，居住的多是贵族和富有的中产阶级。而伦敦的中产阶级推崇的却是贵族阶级的文化，这是在经济上逐渐丧失优势的贵族阶级有意建立文化自信的结果，“贵族阶层高雅与浪漫的生活方式使资产阶级的金钱与财富变得庸俗”（陈礼珍，《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19），这也恰好解释了玛格丽特长居乡村的母亲对商业的观念已有转变，认为经商发了财的赫尔曼家可以作为有教养的邻居走动时，玛格丽特依然表现出对商人的轻蔑与不懈。玛格丽特在伦敦接受的贵族教育中被强化的同情心与责任感，让她无法认同工业社会中现金联结的人际关系。十年的伦敦生活也让习惯了城市物质文明的玛格丽特无法满足于乡村贫穷落后的状态了：家里的书太少，不能提供多少娱乐；母亲对父亲的职务和经济拮据的频繁抱怨，扰乱了家中的安宁。玛格丽特虽然认识到乡村物质层面上的落后，但在乡村度过的童年生活、牧师之女的身份、乡村自由的氛围以及邻里间的友好关系，让她依然从情感上认同维系这种社会关系的伦理规范。

玛格丽特的父亲辞去乡村教区牧师职务，举家搬迁至工业城市米尔顿，让玛格丽特的生活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引发这一变动的直接原因是父亲宗教见解发生变化，不能再担任国教牧师职务。然而这却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要搬去城市而不是别的乡村教区。除去宗教维度的考量，促使他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则是经济层面的，他告诉对工业城市充满抵触的女儿，“我上那儿可以挣钱养家”（39）。这也表明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中，改善经济状况是人们较为普遍的动机。在这一生活环境的变迁中，玛格丽特也从有教养的牧师之女变为了节俭度日的家庭教师之女。

玛格丽特对工厂主的偏见、对身份的评判标准以及对传统伦理的坚守，让她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当玛格丽特听到父亲要去米尔顿以家庭教师的身

1 参见朱虹：“从阶级矛盾到文化冲突——《南方与北方》赏析”，《名作欣赏》3（1995）：27。



份挣钱养家时，她面露轻蔑的神色，发出了“厂主们要古典作品、文学或是一位有教养的先生的学问造诣究竟有什么用”（41）的不懈与质疑。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厂主们忙着追逐财富，古典文学并不能帮助他们获取财富；二是他们学识有限，不能很好地学习古典文学。无论是不需要还是不能够，都表明了玛格丽特的文化优越感和对工厂主的偏见。迁居米尔顿后，玛格丽特首先面对的是工业城市中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与乡村清新自然的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次要承受空间变迁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玛格丽特通过两种途径在工业城市中寻求身份认同，一是以教养为标准来寻求身份认同，然而这种标准却受到了米尔顿人以财富为标准的挑战。在赫尔斯通，相较于经济水平，人们更看重职业和学识，所以玛格丽特家在乡村中备受尊重。但在米尔顿，人们相信社会地位由经济实力建构，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此有过精妙的论述：“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恩格斯 331），桑顿就是人们以金钱为衡量标准所认同的领头人。二是以她所认同的乡村传统伦理为依托来寻求身份的认同。以拜访和物质帮助的形式来表达对穷人的怜悯与同情，是玛格丽特认同的传统伦理，然而在工业城市，工人对独立和平等的追求让这种伦理失去了现实基础。玛格丽特带有慈善性质的拜访，在工人希金斯看来却是不礼貌的行为，玛格丽特不能像在赫尔斯通那样做乐善好施的女主人享受身份的优越感。玛格丽特通过两种途径寻求伦理身份的认同，皆以失败而告终。玛格丽特从有教养的牧师之女到节俭度日的家庭教师之女的身份落差，既让她陷入了价值观的困惑，又促使她在不得不接受客观环境加诸于生活的不利影响时，尝试着做出改变。

玛格丽特在与桑顿的接触中对米尔顿和商业有了新的认识，逐渐认同了工业文明。玛格丽特与桑顿关于南方乡村和北方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态度与进取精神、人际关系与责任意识的争论，让玛格丽特对米尔顿人的价值观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开始认真思考父亲所说的“在米尔顿这儿，你应该学一种不同的语言，并且凭一种不同的标准来衡量”（181）。正因如此，在桑顿家举办的宴会上，玛格丽特对桑顿的看法有了转变，甚至对其他的工厂主，以至商业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从嘲讽厂主们对科技和机械力的盲目自信，转变为愿意倾听他们对商业的谈论，欣赏他们流露出的进取精神。当玛格丽特父亲的朋友，居住在牛津的贝尔先生前来拜访时，玛格丽特已认同了商业理念，完全支持商业的发展，能够站在米尔顿人的一方与其展开辩论。重返伦敦的玛格丽特，听到“她姨母和表妹一直用一种厌恶、轻蔑的口气谈到米尔顿”（475），就会因自己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感觉而羞愧，这既表明玛格丽特从内心深处对商业的认同，又表明对工业城市和商业理念的接受虽然需要一个过程，却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玛格丽特对工业文明的态度在继承财产后的伦理选择中得到了进一步的

体现。桑顿的工厂面临破产危机，玛格丽特选择以商业借贷的形式为桑顿提供资金，使其能够继续经营工厂。玛格丽特的这一选择让她拥有了新的身份，也即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债权人身份。玛格丽特之所以做出如此选择，第一是对桑顿的诚信品质以及拥有了缺失的同情心和责任感的认同；第二是她可以获得高于银行的利息，这是她对米尔顿商业理念的接受与所学经济知识的运用；第三是她对桑顿与工人建立的新型伦理关系的肯定与支持。玛格丽特债权人身份的建构，既是她接受北方文化的结果，也为财富赋予了更为积极的意义。玛格丽特虽然从始至终都具有丰富的同情心和强烈的责任感，但因家境并不富裕，无论是前期生活在赫尔斯通，还是后来居住在米尔顿，她所能做的事情实则非常有限，只能为身边的穷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玛格丽特没有接受北方的价值观念，那么她继承的财产，可能成为她丰厚的陪嫁，抑或是存入银行为以后的生活提供物质保障。玛格丽特债权人身份的建构和对商业的支持，象征性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胜利以及工业文明相较于农业文明具有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桑顿经过三次伦理选择，认同并发展了南方传统文化；玛格丽特通过三次身份建构，支持并参与到工业活动中。玛格丽特与桑顿在相互影响中做出的改变以及他们最终的结合是南方农业文明与北方工业文明相融合的体现。

### 财富与道德：文化愿景的伦理表达

南方农业文明与北方工业文明的融合是通过桑顿对南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玛格丽特对北方工业文明的接受实现的。桑顿弥补了缺失的同情心与责任感，拥有了获得与管理财富的道德前提，突显了南方传统文化中的同情心与责任感在工业社会中的积极作用。玛格丽特肯定了工业文化中的进取精神和独立意识对创造财富、促进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将继承的财产投入工业活动，支持商业的发展。无论是桑顿对道德完善的追求，还是玛格丽特对财富理念的认同，都表明财富追求与道德追求二者并不矛盾，财富与道德的兼得更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对于财富与道德的关系，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在《金河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 1850）<sup>1</sup>中进行了生动的阐释：财富的获得与管理都需要道德前提，“这些道德前提包括同情心、公平心、奉献精神、勇敢的气质和诚实的品格”（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178）。维多利亚时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北方的盛行，造成了重物质轻道德的现象。成长于北方的桑顿同情心与责任感的缺失，使其不能有效地处理劳资问题，对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代表南方传统文化的玛格丽特继承财产和桑顿通过道德的完善获得玛格丽特的资金支持得以继续

1 See John Ruskin, "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 *Unto This Last and Other Writings*, (ed.) Clive Wilme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5) 49-71.

经营工厂的情节安排，似乎表明道德与财富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财富仿佛是对道德的褒奖。

桑顿从父亲经商失败并背负债务的阴影中建立自己的事业，依靠的正是诚信的品质。在事业遭遇危机时，他宁可破产，也不愿用债权人的资产从事投机生意，也是对这种品质的坚守。投机买卖的风险对别人而言，是成败的不可预知，对他而言，不可预知的两种结果却导向一个共同的结局：如果失败，倾家荡产不可避免；即便成功，也会因想到“为了自己增加一点儿可鄙的财富，竟然使许多人都冒破产的风险”（483）而良心不安。这种在财富的诱惑下对诚信的坚守，在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的工业城市中显得弥足珍贵。无论是桑顿从雇工到工厂主的身份转变，抑或是面临破产危机依然坚守初心的选择，都彰显了诚信的重要性。

诚信是桑顿在商界立足的基础，然而同情心与公平心的缺失却让他陷入了困境。桑顿直言不讳地谈及商业中的生存竞争，认为商业中必然的盈亏，会使竞争中的失败者被发财致富的同伙人践踏到脚下。他对贫穷的工人同样缺乏同情心，认为他们贫穷是因为自身缺乏远见和放纵任性。桑顿宣称的公平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这在借用兵士的力量对工人进行武力镇压的选择中得到证明。此时的桑顿虽然拥有财富，但日益激化的劳资冲突使其面临着失去财富的威胁，罢工产生的影响就是导致他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玛格丽特的影响下，拥有了同情心与公平心的桑顿，与工人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并用实际行动改善工人的生活环境。桑顿最终得到玛格丽特的认同和资金支持挽救了破产危机，则表明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财富会失而复得。“文学作品的教诲功能主要是通过道德榜样实现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48），桑顿是盖斯凯尔塑造的开明工厂主形象，承载了作者的道德理想。

作为南方传统文化代表的玛格丽特对北方工业文明的认同既突显了工业文明的进步意义，又引发了对乡村的忧虑与反思。工业文明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物质水平的发展和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相应的改善，即便是贫穷的工人鲍彻家，“家具是赫尔斯通的长工们绝不会想着买的，通常吃的食物是他们会看作奢侈品的东西”（181）。工厂主们崇尚科学与进步，工人阶级的独立和公平意识也日益增强，工业文明的发展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南方乡村赫尔斯通物质相对贫乏，人们的思想也呆板落后。接受了米尔顿城市价值观的玛格丽特，重返赫尔斯通时，已能审慎地看待乡村的变化，客观地评判乡村保守落后的一面。乡村的变化所引发的陌生感和失落感最终也让位于她对变化的接受与认同，“如果世界停滞不前，那它就会衰退和腐朽”（457），乡村生存环境的改善也需要进取精神和对财富的合理追求。

盖斯凯尔创作《南方与北方》时，正值经济繁荣发展的维多利亚中期。

盖斯凯尔通过人物在具体伦理环境中的伦理选择和身份建构，肯定了工业文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并倡导用来自传统的力量对其约束和改造。她为我们塑造了桑顿这样一个理想的工厂主形象，让具有南方传统文化优势的玛格丽特，来弥补其成长于商业竞争环境导致的同情心与责任感的缺失。桑顿对机械力量的崇拜，对自由和独立的推崇，均在玛格丽特的影响下得以重新审视。盖斯凯尔采用维多利亚式的愉快结局让冲突得以解构，巧妙地实现了道德与财富的融合，突显了作品的伦理价值。

诚然盖斯凯尔也有自己无法摆脱的困境，尽管她已敏锐地察觉到工人的觉醒，他们罢工表面上是表达对工资被削减的不满，实则反抗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公，所以她才让罢工领袖希金斯说出他们站起来搏斗是“为了正义和公道”（153）这样慷慨激昂的话语。但她并没有赋予工人社会变革的力量，对于工人运动，她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带有偏见，把工会描写成另一种专制统治，把工人的暴动看作是非理性意志的体现。她把社会改良的希望寄托在具有了传统文化教养的开明工厂主身上，并提出道德与财富相结合的愿景，相较于其第一部工业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 1848）中理想化的和解，更具现实意义。

盖斯凯尔笔下的乡村，因呈现了真实的苦难，不再成为逃避城市的退隐之地；城市也因彰显了进取精神焕发出活力。城市与乡村在表面上的相互对立下，在各自的苦难中，彰显了自身的内在价值。面对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引发的焦虑，盖斯凯尔以略带忧郁却又乐观的笔调，将尖锐的社会问题转化为对个人道德品质的认同，进而超越了阶级立场，上升至人类共通的情感领域。即使乡村走出了因承载怀旧情绪而被建构的英格兰神话般的存在，它依然彰显着独特的文化魅力。

### Works Cited

托马斯·卡莱尔：《文明的忧思》，宁小银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

[Carlyle, Thomas. *Past and Present*. Trans. Ning Xiaoying.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陈礼珍：《天使与鸽子：盖斯凯尔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Chen Lizhen. *The Angel and the Dove: A Study of Elizabeth Gaskell's Novel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 *Victorianism in the Novels of Elizabeth Gaskel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弗里德西斯·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Engels, Friedrich.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Tran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Marxism Friedrich Engels Vladimir Lenin Stalin's work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6.]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南方与北方》,主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Gaskell, Elizabeth. *North and South*. Trans. Zhu W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9.]

Kettle, Arnold. *The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 6: From Dickens to Hardy*. Ed. Boris For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8.

Meckier, Jerome. *Hidden Rival in Victorian Fiction: Dickens, Realism, and Revaluation*. Lexington: The UP of Kentucky, 198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伦理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Nie Zhenzhao. "Ethical Choi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2020): 71-92+205-206.]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 12-22.]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An Introd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Beijing UP, 2014.]

——:《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Thomas Hardy: A Study of His Novel*.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1992.]

Ruskin, John. "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 *Unto This Last and Other Writings*. Ed. Clive Wilme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5.

Shuttleworth, Sally. "Introduction." *North and South*. Ed. August Easson. New York: Oxford UP, 2008.

Stoneman, Patsy. *Elizabeth Gaskell*.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6.

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Yin Qiping. "An Apologia of Culture":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Britai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3.]

——:“经由维多利亚文学的文化观念流变”,《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5(2017):83-91。

[—."Changes in the Idea of Culture in the Midst of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Journal of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5(2017): 83-91.]

朱虹:“从阶级矛盾到文化冲突——《南方与北方》赏析”,《名作欣赏》3(1995):26-30。

[Zhu Hong. "From Class Conflict to Cultural Conflict: An Appreciation of *North and South*", *Masterpieces Review* 3(1995): 26-30.]